



# 论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及 CAS 裁判法理

向会英<sup>1</sup>, 张林<sup>2\*</sup>

**摘要:** 足球合同违约不仅导致赔偿, 还可能引发体育制裁。将此类由体育制裁引发的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告。在审查此类案件中, 仲裁庭首先确认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 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 仲裁庭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在处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 CAS 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体育制裁方面的裁量权, 同时确保这一裁量权的行使正当及在合理范围之内。

**关键词:** 足球; 合同违约; 体育制裁; 国际体育仲裁院; 裁判法理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24)03-0031-08

DOI: 10.12064/ssr.2023102701

## On Sports Sanctions for Football Contract Breach and CAS Adjudication Jurisprudence

XIANG Huiying<sup>1</sup>, ZHANG Lin<sup>2\*</sup>

(1. Sports Law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Breach of football contract not only leads to compensation, but also may trigger sports sanction. To submit disputes arising from sports sanction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the football regulatory authority must act as the defendant. In reviewing such cases, the CAS Panel firstly confirms whether the breach of contract occurs during the protection period. The sports sanction imposed on players and clubs are different, thu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review requirements and referee standards of CAS. In dealing with such cases, CAS respects the discretion of football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such sports sanction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exercise of this discretion is legitimate an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Keywords:** football; contract breach; sports sanction;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djudication jurisprudence

由合同违约引发的争议是足球领域最多的一类, 以被誉为“国际最高体育法庭”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为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 CAS 官方网站发布的 1 420 个足球判例中就有 620 个涉及合同违约<sup>[1]</sup>, 近 44%。在国际足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的管理框架下, 合同违约不仅需要赔偿, 还可能受到体育制裁(sporting sanction)。2023 年 12 月 21 日, CAS 官方网站发布了球员 Jaka Čuber Potočnik 和德国科隆足球俱乐部上诉案<sup>[2]</sup>的裁决结果。球员因违约, 受到禁赛 4 个月和赔偿 60 000 欧元的制裁, 德国科隆足球俱乐部也被禁止在两个完整注

册期内在国际或国内范围内注册新球员。这一裁决在足球领域引发了对合同违约体育制裁问题的热议。

随着越来越多涉中国当事人的足球争议上诉至 CAS, 深入了解和把握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的 CAS 裁判规则已成为实际需求。另外, 《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48 条吸纳了 FIFA《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则》(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Players, RSTP) 第 17 条关于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体育制裁的规定, 并且, 2023 年 2 月 11 日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正式在北京成立, 迈开了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建设实质性的第一步, 而中国足球主管机构如何适用体育制裁规则, 以

收稿日期: 2023-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058)。

第一作者简介: 向会英, 女,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法学。E-mail: xianghuiying@shupl.edu.cn。

\* 通信作者简介: 张林,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E-mail: Zhanglin1954@sina.com。

作者单位: 1. 上海政法学院 体育法治研究院, 上海 201701; 2. 上海体育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8。



及体育仲裁机构如何审查和裁判此类的争议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基于这些需要,有必要对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的CAS裁判法理进行研究。

## 1 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的规则及内涵

体育制裁即体育处罚,是指有制裁权的机构与个人依据有关法律或规则对体育中的不当行为或体育人的不当行为作出惩戒性的决定<sup>[3]</sup>。一般来说,体育制裁是基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由违反相关纪律规则引起的。本文的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是由合同违约引起的,在一定条件下触发足球主管机构对合同违约行为作出的惩戒性决定,是一种为了维持合同稳定的特殊机制。FIFA RSTP第17条规定了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体育制裁后果。根据此规定,违反雇佣合同不会被强制继续履行合同,但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还可能受到体育制裁。2001年版FIFA RSTP<sup>[4]</sup>对作为国际足球合同违约的后果之一体育制裁作了明确规定,其第23条规定了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以及诱导违约的球员代理人的体育制裁。2005年版RSTP<sup>[5]</sup>则第17条第3款和第4款分别规定了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及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的体育制裁,并提出了保护期(protected period)的概念。2018年版RSTP<sup>[6]</sup>则在2005年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球员实施体育制裁的起止时间和对俱乐部排斥适用第6条第1款的规定以加强威慑力。2022年版RSTP<sup>[7]</sup>则沿用了2018版的规定,其第17条第3款规定,球员在保护期内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不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还要受到体育制裁,由主管机构对其实施禁赛4个月或严重情况下禁赛6个月的体育制裁。第17条第4款规定,在保护期内俱乐部违约或导致违约将禁止在至少两个连续的注册期内在国际和国内注册新球员。

FIFA RSTP第17条第3款、第4款对体育制裁后果规定的制定,是鉴于经济赔偿并不能对一些俱乐部违约起到足够威慑作用,而必须对这些俱乐部采取更严格的体育制裁以加强合同稳定。从制裁的对象来看,第3款和第4款分别规定了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被发现诱导(induced)球员违约的“任何俱乐部”<sup>[8]</sup>。从制裁内容来看,针对不同对象适用的体育制裁内容不同。对球员实施禁赛,将直接制约球员从事职业活动,对球员具有很强的威慑力;禁止俱乐部注册新球员,将直接影响俱乐部在比赛中的竞争力,是对俱乐部的有力制裁。由于在两个赛季之间实施制裁不具有足够的实际威慑作用,2018年版RSTP规定对球员的禁赛是从新俱乐部锦标赛的首场比赛开始计算。如果球员尚未在新俱乐部注册,那么裁决

机构实施的制裁将自新俱乐部注册之日起生效。此外,为加强对俱乐部制裁的有效性,2018年版RSTP在第17条第4款规定了“俱乐部不得利用RSTP第6条第1款的例外情况和临时措施来规避制裁”。

## 2 CAS对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

根据CAS《体育仲裁条例》第R58条的规定,对于反对由合同违约引起的体育制裁的上诉足球争议,CAS首要适用FIFA RSTP第17条第3款、第4款的规定。从字面上来看,条款中规定的体育制裁都用了应当(shall)一词,似乎是自动适用体育制裁,但CAS仲裁庭认为,规则必须根据其真正含义加以解释,仲裁实践代表了FIFA和CAS对该条款的解释、执行和遵循的真正含义<sup>[9]</sup>。CAS仲裁庭认为,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不予实施体育制裁,施加体育制裁也不是强制性的,应适用逐案处理、评估所实施体育制裁对于违约方具体行为的正当性(justify)<sup>[10]</sup>。由于对不同对象施加的体育制裁不同,CAS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也存在区别,并且在审查具体的体育制裁之前,CAS先审查体育制裁的被告资格(standing to be sued)。

### 2.1 体育制裁的被告资格

在CAS仲裁程序中,被告资格属于实体性问题。在处理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仲裁程序中,CAS首先审查被告资格。根据RSTP的规定,体育制裁是由足球主管机构,通常是FIFA作出的。CAS在判例中强调,只有主管机构有权实施此类制裁,也只有主管机构有权撤销(withdraw)其对俱乐部、球员或其他人员实施的体育制裁。在反对FIFA体育制裁的仲裁程序中,涉及FIFA与其成员的等级关系,而不是FIFA与其成员的合同关系,因此,只有在FIFA作为被告人时,CAS才能处理涉及FIFA制裁的上诉。如果上诉方未将FIFA列为被告,CAS则无法实施或推翻由FIFA对其成员实施的体育制裁<sup>[11]</sup>。在Persepolis Football Club v. Rizespor Futbol Yatirimclari案<sup>[12]</sup>中,上诉人反对FIFA争议解决委员会(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 DRC)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上诉人赔偿789 500欧元及罚金利息,以及被禁止在两个完整、连续的注册期内在国内或国际注册新球员。由于上诉人未将FIFA作为被告人,CAS仲裁庭驳回了上诉人反对体育制裁的请求。

FIFA规则并未明确规定被告资格,由于FIFA是根据《瑞士民法典》成立的协会,因此根据CAS《体育仲裁条例》第R58条的规定,辅以适用瑞士法



律。在瑞士法下,如果被告人受到“有争议的权利”(disputed right)的约束,则被告人有被诉资格。换言之,只有当事人在争议中有一定利害关系时,才有被诉资格以及有可能被传唤至 CAS<sup>[13]</sup>。Ana Kuže 诉天津泰达案<sup>[14]</sup>的仲裁庭指出,在有关体育制裁的争议中,协会是主要利益相关者,也是受纠纷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最佳代表,因此应将协会作为被告人。在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中,即使受损害的球员或俱乐部与争议存在关联,但这些球员或俱乐部不能从过错方受到体育制裁中获得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此不能要求对过错方施加体育制裁,也不能将过错方作为此类争议的被告人。

## 2.2 合同保护期

合同违约发生在合同保护期内是施加体育制裁的先决条件。通常来说,职业球员的合同期最长 5 年,保护期指职业球员在 28 岁生日前生效的合同的 3 个完整的赛季或 3 年,或者 28 岁生日后生效合同的前 2 个完整的赛季或 2 年。根据 RSTP 规定,不管对于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还是其他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构成体育制裁的强制性先决条件是在雇佣合同的保护期内发生违约。如果合同违约发生在保护期以外,原则上不会适用体育制裁,但对于球员保护期之后违约,应根据诚信(good faith)原则的要求在保护期之后终止合同须在赛季结束后 15 天内发出通知,否则也会受到纪律制裁。总之,对于是否确认实施体育制裁,CAS 仲裁庭先审查合同违约是否发生在保护期内。Jaka Čuber Potočnik 和德国科隆足球俱乐部上诉案涉及球员签约后 8 个月内即在保护期内违约而受到体育制裁。

就保护期内的确认标准而言,CAS 仲裁庭认为,保护期起始于合同签署,而不是合同生效。在 RCD Mallorca SAD & A. v. FIFA & UMM Salal SC 案<sup>[15]</sup>中,上诉人认为,在发出终止函时第二份合同尚未生效,因此没有违反保护期的规定。仲裁庭指出,即使为合同适用设定了初始期限,但是雇佣合同自签署之日就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确认俱乐部违反了保护期的规定。此外,年龄比较大的球员倾向于签订期限较短的合同,因此不同年龄阶段的保护期的时限不同。如果签订的合同期限等于或短于保护期,那么整个合同期都将被“保护”。如果续签现有合同,续签的合同被视为签署的新合同,保护期则重新开始。对球员合同设定保护期的目的是对合同期限的最重要部分规定足够严厉的制裁措施,试图对违约方起到威慑作用来实现合同稳定。

## 2.3 不同制裁对象的审查要件与裁判标准

针对不同的制裁对象,CAS 的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存在区别。

### 2.3.1 违约球员

CAS 对违约球员体育制裁的审查事项主要包括确认是否存在单方面违约、特殊情况(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及加重情况(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1)单方面违约。构成球员单方面违约或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是体育制裁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属于单方面违约或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CAS 仲裁庭不能根据 RSTP 第 17 条的规定进行裁定,而是根据《瑞士债法典》第 337b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全面考虑案件相关因素情况下自行决定终止合同的经济后果,球员在终止合同后也不承担体育制裁后果<sup>[16]</sup>。例如,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买断条款”,即预先确定一方为提前终止合同而应支付金额的条款。这意味着双方同意球员在任何时候终止合同,包括在保护期内,因此不得因提前终止合同而对球员实施体育制裁。在实践中,CAS 对“买断条款”严格要求措辞明确<sup>[17]</sup>,任何措辞的轻微偏离都将导致不被认定为“买断条款”,从而不能避免体育制裁。FIFA DRC 也不轻易确认“买断条款”,因此,通过“买断条款”规避体育制裁必须严格按照“买断条款”的要求签订合同,否则存在风险。

(2)特殊情况。FIFA 规则和 CAS 判例并未明确定义什么是特殊情况。2001 年版 RSTP 第 23 条规定了允许对球员减少施加体育制裁的特殊情况,而 2005 年版 RSTP 取消了该规定。在实践中,CAS 仲裁庭审查是否存在特殊情况仍是确定对球员是否施加制裁的重要内容。CAS 判例表明,如果球员在保护期内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且无特殊情况,那么将确认 FIFA 对球员施加的体育制裁。在 M.P. v. FIFA & PFC Krilja Sovetov 案<sup>[18]</sup>中,在没有任何特殊情况的前提下,球员没有正式警告或书面通知 Krilja Sovetov 俱乐部而单方面终止了合同,属于球员长期无故缺席,因此仲裁庭确认了 FIFA DRC 的决定,对球员实施了禁赛 4 个月的制裁。

CAS 仲裁庭对当事人提出抗辩的特殊情况有着严格的要求。在 Ariel Ortega v. Fenerbahçe & FIFA 案<sup>[19]</sup>中,球员在合同第二年末提前终止合同并提出了自己特殊情况,包括:第一,FIFA 在合同后期介入;第二,其妻子怀孕。仲裁庭认为,球员所提出的理由不能构成免于制裁的特殊情况,确认了 FIFA 对其实施禁赛



4 个月的制裁。在 FC Pyunik Yerevan v. E., AFC Rapid Bucuresti & FIFA 案<sup>[10]</sup>中,由于案件涉及的球员在签订雇佣合同时年仅 16 岁,且上诉人对其注册也存在争议。仲裁庭认为,制裁对球员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是过度和不适当的,因此确认了球员的特殊情况,使球员免于体育制裁。总之,特殊情况适用于对球员体育制裁的减免,但这种特殊情况的体育制裁减免必须是例外。CAS 仲裁庭对球员在保护期内提前终止合同体育制裁提供了减免的可能,前提是需要明确有力的证据证明该体育制裁偏离或不符合第 17 条第 3 款规定的理念。仲裁庭对特殊情况审查,体现了全面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以保障体育制裁的合理性。

(3)加重情况。CAS 仲裁庭对加重情况的评估,主要考虑是否应增加对违约球员的制裁力度。如果没有加重情况,则施加禁赛 4 个月的制裁。如果存在加重情况,则施加禁赛 6 个月的制裁。2001 年版 RSTP 第 23 条规则列举了加重情况,例如未发通知和屡次违反合同的情况,2005 年及之后的 RSTP 虽未如此列举,但在 CAS 实践中仍将“屡次违犯”作为加重情况评判的依据。在 S. & Zamalek SC v. PAOK FC & FIFA 案<sup>[20]</sup>中,一名球员在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内两次违约,仲裁庭认为该球员非常不尊重职业足球的合同稳定原则,应视为加重情况,因此确认了 FIFA 对该球员实施严重情况下的 6 个月禁赛。仲裁庭对加重情况评估,体现了罪罚相当,符合相称性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 2.3.2 违约俱乐部

违约俱乐部是指无正当理由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原俱乐部。虽然 RSTP 第 17 条第 4 款未明确区分对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的体育制裁,但 CAS 仲裁庭对两者的审查存在区别。随着 FIFA 规则的变化,CAS 对违约俱乐部体育制裁的裁判也经历了从“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到“屡犯”(repeated offender)的转变。

(1)严格责任。FIFA 和 CAS 在早期判例中对违约俱乐部体育制裁的裁判适用严格责任。换言之,一旦确认俱乐部在保护期内违约,就会对违约俱乐部实施体育制裁。在 Kuwait Sporting Club v. Z. & FIFA 案<sup>[21]</sup>的仲裁庭指出,当确定俱乐部在雇佣合同的保护期内终止合同,CAS 仲裁庭则基于严格责任实施 FIFA 规则,根据 RSTP 第 17 条第 4 款的规定禁止违约俱乐部在国际或国内注册新球员。

(2)屡犯。自 2014 年起,FIFA 确立了某些加重因素如屡犯,才对保护期内违约的俱乐部施加体育制裁。这里的屡犯是指俱乐部在过去多次因无正当

理由提前终止与球员的雇佣合同而被追究责任,如一家俱乐部在过去的 24 个月内 4 次违反了与球员的雇佣合同而被追究责任,则为屡犯,那么主管机构应对其实施体育制裁。在 Khazar Lankaran Football Club v. FIFA 案<sup>[22]</sup>中,阿塞拜疆 Khazar Lankaran 俱乐部单方面提前终止与球员的雇佣合同,鉴于该俱乐部在近几年有超过 11 次类似赔偿,仲裁庭确认了 FIFA DRC 对该俱乐部实施的体育制裁。CAS 仲裁庭认为,为了更好地确保俱乐部承担合同义务,在较短时期内多次被 FIFA DRC 或 CAS 确认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屡犯俱乐部,根据 RSTP 第 17 条第 4 款对俱乐部严格施加体育制裁<sup>[23]</sup>。

CAS 在评估一家俱乐部的多次违犯是否构成屡犯时,通常不会计算较长时间内的再次违犯。例如,10 年以上时间内的再次违犯就不属于屡犯。在 2015 年的 Diego de Souza Andrade v. Al Ittihad Club & FIFA 案<sup>[24]</sup>中,针对上诉人指出俱乐部分别在 2005 年、2006 年和 2007 年涉及合同违约起诉属于屡犯时,仲裁庭认为,这些违犯情况时隔久远,不能构成对本案屡犯的确证。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屡犯的原则仅适用于违约俱乐部,而不适用于诱导违约的新俱乐部。CAS 仲裁庭对违约俱乐部从严格责任向屡犯转变,体现了仲裁庭考虑体育制裁后果与足球发展利益的均衡性。

### 2.3.3 诱导球员违约的俱乐部

新俱乐部是指引进球员的俱乐部。根据 RSTP 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对于新俱乐部而言,签约一名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的职业球员,除非有相反的规定,否则应推定为俱乐部诱导球员违约。除了新俱乐部,这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包括所有教唆、诱导球员违约的俱乐部。这一规定建立了一个可反驳的假设,即如果诱导违约俱乐部不能证明其没有导致违约,则将受到体育制裁。

是否构成诱导(inducement)是 CAS 仲裁庭确认是否实施体育制裁的关键。在 Jonathan Mensah & Evian Thonon Gaillard FC v. FIFA & Udinese Calcio S.p.A 案<sup>[25]</sup>中,签约违约球员的法国 Evian Thonon Gaillard 俱乐部未能推翻 RSTP 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的推定,仲裁庭维持了上诉决定,禁止其在两个连续的注册期内在国内和国际注册新球员。对新俱乐部而言,提供反驳诱导的证据证明是驳回体育制裁的关键。在 FC Pyunik Yerevan v. E., AFC Rapid Bucuresti & FIFA 案<sup>[10]</sup>中,罗马尼亚 Rapid Bucuresti 足球俱乐部虽然签约了违约球员,但在球员的申明中,该俱乐部建议该球员在与俱乐部合同到期之前留在喀麦隆,Rapid



Bucarest 俱乐部也通过证据证明没有诱导球员违约。仲裁庭认为,Rapid Bucaresti 俱乐部反驳了其诱导球员与亚美尼亚 Pyunik Yerevan 俱乐部违约的假设,因此未对 Rapid Bucaresti 俱乐部施加体育制裁。在前述科隆俱乐部案件中,科隆俱乐部在 16 岁球员 Jaka Čuber Potočnik 与斯洛文尼亚奥林匹亚俱乐部解约后一天与该名球员签约,并且这名球员与奥林匹亚俱乐部签约不满 8 个月。虽然科隆俱乐部声称没有诱导球员违约,但因缺乏有力证据,仲裁庭认为俱乐部尽职尽责不力(poor due diligence),应承担体育制裁。

相比较而言,FIFA DRC 倾向于确认新俱乐部构成诱导,而 CAS 仲裁庭则通过考察每个案件的特殊性来确定新俱乐部是否参与诱导。在 M. & Football Club Wil 1900 v. FIFA & Club PFC Naftex AC Bourgas 案<sup>[26]</sup>中,FIFA DRC 认为,比利时 Bourgas 俱乐部在 2006 年 1 月 25 日书面通知瑞士 Wil 俱乐部和瑞士足协,球员仍与其存在合同关系,而瑞士 Wil 俱乐部在 2006 年 2 月 1 日与该球员签订合同,显然存在诱导,因此适用第 17 条第 4 款的体育制裁,禁止 Wil 俱乐部在两个完整的注册期内注册国际、国内新球员。在上诉程序中,CAS 仲裁庭则认为,诱导是对俱乐部体育制裁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没有收到保加利亚足协关于国际转会证明(International Transfer Certificate, ITC)的信息,瑞士足协在 2006 年 3 月 18 日决定暂停注册该球员。这一事实应支持 Wil 俱乐部的信用并使 Wil 俱乐部相信球员与 Bourgas 俱乐部没有有效的合同。因此,仲裁庭认为,Wil 俱乐部没有实施诱导,驳回 FIFA DRC 对 Wil 俱乐部施加的体育制裁。总之,CAS 仲裁庭确认诱导俱乐部是否应受到体育制裁的关键在于俱乐部能否提供强有力反驳诱导的证据。

### 3 CAS 处理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的一般规则

虽然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是因合同违约引起的,但所涉及的体育制裁争议仍属于纪律性制裁。CAS 仲裁庭一方面尊重足球主管机构在纪律制裁方面的裁量权,另一方面确保这种裁量权行使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 3.1 尊重协会制裁权

根据瑞士法下的协会自治原则,协会有权管理机构 and 机构成员,有权通过规则中的道德标准控制和监督其机构和成员的行为,也有权制裁受其规则约束的会员。尊重体育协会的制裁权,实际是尊重体育自治,对于体育发展至关重要<sup>[27]</sup>。CAS 仲裁庭认

为,施加体育制裁的性质和范围是体育组织规则的一部分。如果该规则被认为过于严厉或无差别适用,则应由体育组织本身或其部门更改规则,仲裁庭不能更改规则<sup>[28]</sup>。换言之,仲裁庭在适用有关规则时不能取代规则制定者。在 Al-Gharafa Sports Club v. Paulo Cesar Wanchope Watson 案和 Paulo Cesar Wanchope Watson v. Al-Gharafa Sports Club 案<sup>[29]</sup>中,仲裁庭强调,如果俱乐部被发现违约,球员无权要求,仲裁庭也无权施加 RSTP 规定的体育制裁和纪律措施,实施体育制裁的权力完全在于 FIFA,CAS 不能干涉 FIFA 的权力。即使 CAS 在判例中表达了对 FIFA 一些施加体育制裁政策的担忧,以及建议 FIFA 公开说明新的制裁措施,并指出协会规则的不稳定将对协会不利(contra proferentem principle)<sup>[30]</sup>,但未直接干预体育制裁规则。CAS 仲裁庭认为,对体育协会制裁权的评估不包括对目标合法性和决策实质价值的评估,因此,无论该决定对于一方的利益影响有多么严重,如果该决定没有明显的不合理,且根据适当的程序由联合会有关机构作出,则该决定不能被撤销,必须予以维持<sup>[31]</sup>。

#### 3.2 确保体育制裁的正当性

FIFA 对合同违约的当事方及导致违约者施加的体育制裁,属于行业纪律制裁<sup>[32]</sup>。CAS 判例认为,此类争议处理中体育制裁应被证明是正当的。首先,CAS 仲裁庭要求施加体育制裁符合合法性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根据合法性原则,犯罪或制裁必须事先由法律明确界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不能定罪或制裁,并且必须排除对现有规则的调整,使其能够适用于立法者没有明确惩罚的情况或行为,这是法不明文不为原则(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sup>[33]</sup>。其次,CAS 判例一致认为,这种制裁必须是可预测的(predictability)<sup>[34]</sup>,可预测性要求被指控的行为与制裁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并要求对各自条款作出狭义的解释。最后,CAS 仲裁庭认为,所施加的体育制裁决定还应符合强制性法律原则,如受先前惯例约束原则、平等对待原则以及善治原则。总之,CAS 确保体育制裁正当,只有在这一原则下出现特殊情况如任意性、滥用自由裁量权、歧视或违反相关强制性法律时,才能作出干预,驳回主管机构的体育制裁决定。

#### 3.3 确保体育制裁的合理性

(1)适用相称性原则。相称性原则是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国家广泛接受的一般法律原则,其核心是衡量立法的目的与采用手段之间的合理性,禁止逾



越实现目的而对他人权利和自由进行过度干预。这一原则适用国际反兴奋剂案件<sup>[35]</sup>,也适用于纪律制裁案件<sup>[36]</sup>,同样也适用于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案件。瑞士联邦法院认为,体育组织有权实施制裁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相称性原则的适用,但制裁的本质和范围不能极端严重并与违规行为完全不符合相称性原则。因此,鉴于FIFA规则并未规定合同违约体育制裁的减轻制裁或加重制裁的例外情况,CAS仲裁在具体的案件中主要考虑三方面的情况,确保体育制裁在合理的范围内无极端严重或完全不相称的情况:一是违约行为的严重程度;二是违约运动员的特殊情况;三是受体育制裁一方的利益与足球发展整体目标的平衡。

(2)对缺乏递进制裁制度的批评。FIFA规则并未就对俱乐部施加体育制裁的严重程度提供自由裁量权,RSTP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存在递进制裁制度(gradual sanction system),即没有在实施体育制裁前发出警告或授予最后宽限期的政策以及将两个注册期禁令减少为一个注册期的空间,因此,CAS仲裁庭对俱乐部体育制裁的裁量权仅限于确认两个注册期的转会禁令或撤销转会禁令<sup>[37]</sup>。对于球员制裁的情况也类似,RSTP第17条第3款赋予裁判机构的选择只是对球员实施6个月、4个月禁赛或者极端特殊情况下无禁赛,并无其他选择<sup>[38]</sup>。对于FIFA缺乏递进制裁制度,CAS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FIFA这种不提供区分的体育制裁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决定。例如,FIFA RSTP没有区分俱乐部主动诱导球员违约和因疏忽签约违约球员的情况,采用同样的制裁标准,显然因疏忽而签约违约球员的新俱乐部更加难以找到反驳诱导假设的证据,可能导致对尽职尽责行为实行严苛的体育制裁,而对主动诱导<sup>[39]</sup>行为的制裁又不够严厉。这一批评体现了CAS对足球主管机构体育制裁要符合相称性的要求,也反映了CAS不轻易干预足球主管机构的体育制裁权而通过批评意见促进其改进规则瑕疵。

## 4 启示

上述CAS对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的审查和裁判标准,对CAS仲裁涉及的国内当事人、国内足球主管机构和体育仲裁机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 4.1 CAS仲裁涉及的国内当事人应规范行为,避免受到体育制裁

对于CAS仲裁涉及的国内当事人来说,上述裁

判法理无疑为其避免体育制裁和规范行为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国内俱乐部在签约外籍球员之前,一定要做好尽职调查。另外,由于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并非当然适用,受到体育制裁的当事人可以参考审查事项和裁判标准以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反对此类足球主管机构施加的体育制裁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诉方。值得注意的是,CAS与FIFA DRC在构成诱导认定的差异,为俱乐部维权提供了可能性。

### 4.2 足球主管机构应酌情适用体育制裁,避免“一刀切”

《规定》第48条充分吸纳了FIFA关于体育制裁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将FIFA RSTP中的“shall”直接译为“应当”。如前文所述,尽管RSTP第17条关于体育制裁的适用使用了“应当”(shall)一词,但FIFA DRC和CAS的判例表明,对于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体育制裁的适用并非当然适用,而是采用逐案分析的原则。因此,《规定》第48条的“应当”也不应理解为中国足球协会必须实施体育制裁,而应考虑每个案件的特殊情况,避免“一刀切”。如果中国足球协会按照字面规定的“应当”施加体育制裁而未设置例外情况,实际上对涉及保护期内合同违约的球员或俱乐部按照严格责任实施体育制裁,违背了FIFA DRC和CAS判例中规则的真正含义,不利于球员和俱乐部合理地维护自身权益。因此,足球主管机构可以参考FIFA的做法,在施加体育制裁时采取灵活措施<sup>[20]</sup>,为体育制裁的适用设置一定条件下的例外,通过当事人证据证明体育制裁是否正当以确定是否应施加体育制裁,为球员、俱乐部提供了免受体育制裁的可能。此外,FIFA和CAS判例对违约俱乐部的体育制裁的实施从严格责任到屡犯转变,表明国际足球主管机构在施加体育制裁和维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实现合同稳定,这值得借鉴。

### 4.3 体育仲裁机构应实行区分审查和有限审查,确保体育制裁正当合理

随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实施,我国已建立了体育仲裁机制,并且截至2023年11月27日,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已经依法依规完成第一批3件体育仲裁案件的受理、审理工作。本文认为,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在审查和裁判适用《规定》第48条体育制裁规则引发的纠纷时,可以参考CAS的做法,基于案情并充分考虑不同制裁对象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区分对待保证仲裁程序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基于对体育协会制裁权的尊重,确保体



育制裁正当。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属于足球行业纪律制裁,在反对合同违约体育制裁的上诉中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上诉人。通常来说,合同违约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争议”,但合同违约体育制裁同时也是一个涉及行业纪律制裁的“纵向争议”。这种争议的行业特殊性,导致其被排除在一般仲裁管辖之外,且也不能适用于劳动仲裁的劳动关系。虽然我国法律没有类似瑞士法律对于被上诉人资格的明确规定,但参照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的“谁行为,谁被告”规则,涉及足球主管机构的纪律性制裁的争议应当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上诉人。此外,就仲裁程序而言,如果涉及争议的直接当事人不参与,那么仲裁程序何以继之?因此,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须将足球主管机构作为被上诉人。

第二,针对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的体育制裁,体育仲裁机构应区别对待,确保审查要件和裁判标准的不同。《规定》第 48 条规定的制裁对象包括违约球员、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的俱乐部,对于球员和俱乐部的体育制裁也存在区别,建议体育仲裁机构应借鉴 CAS 处理此类争议的经验,区别对待,尤其是对于违约俱乐部和诱导球员违约俱乐部的审查和裁判应有不同。

第三,体育仲裁机构对足球合同违约体育制裁争议行使有限的审查权。一方面,体育仲裁机构应遵守体育制裁正当原则,即审查限于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强制性法律原则。合法性是指审查体育制裁是否为明文规定;合理性审查所施加的体育制裁和规定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强制性法律原则包括平等对待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只有当体育制裁出现滥用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违背强制性法律原则时,才可撤销或推翻体育主管机构施加的体育制裁。另一方面,体育仲裁机构应坚持不直接干预足球协会体育制裁规则,即使在仲裁机构认识到体育组织的实体规则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只要体育规则不违反法律规定或强制性法律原则,就应坚持有限的审查而不直接干预,这样才能体现对制裁权的尊重和促进体育协会自律自治。对此,新修订《体育法》第 98 条规定了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的六条理由中包含了“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该条可能成为体育仲裁机构尊重体育协会制裁权的“隐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释义》<sup>[39]</sup>将该条进行了限制性的解释:适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错误的;适用已经废止、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援引法条错误的;违反关于溯及力的规定等法律规则情形。这意味着体

育仲裁机构仍拥有体育规则适用的裁量权,因此体育仲裁机构仍应坚持不直接干预体育制裁规则。

## 5 结束语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违约后果,足球合同违约除了经济赔偿以外,还可能受到体育制裁,反对此类体育制裁属于纵向的纪律性争议。这种合同违约争议的特殊性,导致在我国此类争议应被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的一般仲裁机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下的劳动仲裁范围之外,也意味着此类争议交由《体育法》下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是最合适的选择。FIFA 在适用合同违约体育制裁规则时,并未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而是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不断在体育制裁和维护相关者利益之间寻求平衡。CAS 在审理此类争议时,针对不同对象区别审查、酌情裁判,即使对 FIFA 规则瑕疵提出批评意见,也是确保体育制裁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尊重足球主管机构的制裁权。对于我国足球主管机构和新建的体育仲裁委员会来说,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 参考文献:

- [1] The CAS jurisprudence database[EB/OL].[2023-12-06].  
<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Help/Home.aspx>.
- [2] CAS dismisses the appeals filed by Jaka Čuber Potočnik and 1. FC Köln. NK Olimpija Ljubljana appeal very partially upheld [EB/OL].[2023-12-06].<https://www.tas-cas.org/en/general-information/index/>.
- [3] 韩勇.体育纪律处罚研究[J].体育科学,2007,27(4):84-94.
- [4] Regulations for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the players, 2001 edition[R].Buenos Aires/Zurich: FIFA Executive Committee, 2001.
- [5] Regulations for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the players, 2005 edition[EB/OL].(2005-02-25)[2020-10-22] <https://digitalhub.fifa.com/m/247ee479acaa0712/original/hbnv1yed9mu4teok2xg6-pdf>.
- [6]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the players, 2018 edition[R]. Zurich: FIFA Council, 2017.
- [7] Regulations on the status and transfer of the players, 2022 edition[EB/OL].[2022-12-28].<https://digitalhub.fifa.com/m/620d0240c40944ed/original/Regulations-on-the-Status-and-Transfer-of-Players-October-2022-edition.pdf>.
- [8] CAS 2019/A/6463 Saman Ghoddos v. SD Huesca & Östersunds FC & Amiens Sporting Club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 CAS 2019/A/6464 Östersunds FK Elitfotboll AB v. SD Huesca



- & FIFA & Saman Ghoddos & Amiens Sporting Club [EB/OL].(2020-11-10)[2022-01-10].<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6463,%206464.pdf>.
- [9] CAS 2007/A/1429 Bayal Sall v. FIFA and IK Start & CAS 2007/A/1442 ASSE Loire v. FIFA and IK Start [EB/OL].(2008-06-25)[2021-12-28].<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429,%201442.pdf>.
- [10] CAS 2007/A/1359 FC Pyunik Yerevan v. E., AFC Rapid Bucuresti & FIFA [EB/OL].(2008-05-26)[2021-12-28].<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359.pdf>.
- [11] CAS 2015/A/4083 Hønefoss Ballklubb v. Heiner Mora Mora & Belén FC [EB/OL].(2016-04-06)[2021-12-2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4083.pdf>.
- [12] CAS 2017/A/5359 Persepolis Football Club v. Rizespor Futbol Yatirimlari [EB/OL].(2018-05-29)[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5359.pdf>.
- [13] CAS 2008/A/1677 Alexis Enam v. Club Al Ittihad Tripoli [EB/OL].(2009-05-20)[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677.pdf>.
- [14] CAS 2015/A/3910 Ana Kuže v. Tianjin TEDA FC [EB/OL]. [2022-12-28].<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910.pdf>.
- [15] CAS 2009/A/1909 RCD Mallorca SAD & A. v.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 UMM Salal SC [EB/OL].(2010-01-25)[2022-01-18].<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909.pdf>.
- [16] CAS 2020/A/7030 Rúben Tiago Rodrigues Ribeiro v. Sporting Clube De Portugal & CAS 2020/A/7051 Sporting Clube De Portugal v. Rúben Tiago Rodrigues Ribeiro & Al Ain FC & FIFA [EB/OL].(2022-02-14)[2023-12-06].<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7030,%207051.pdf>.
- [17] 向会英,张林. 职业足球无正当理由终止合同赔偿的 CAS 法理[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55(12): 48-55.
- [18] CAS 2006/A/1141 M.P. v. FIFA & PFC Krilja Sovetov [EB/OL].(2007-06-29)[2021-11-26].<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141.pdf>.
- [19] CAS 2003/O/482 Ariel Ortega v/ Fenerbahçe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EB/OL].(2002-11-05)[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482.pdf>.
- [20] CAS 2008/A/1448 S. & Zamalek SC v. PAOK FC & FIFA [EB/OL].(2008-06-25)[2022-12-28].<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448.pdf>.
- [21] CAS 2008/A/1593 Kuwait Sporting Club v. Z. & FIFA [EB/OL].(2008-12-30)[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593.pdf>.
- [22] CAS 2014/A/3797 Khazar Lankaran Football Club v.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EB/OL].(2015-07-09)[2022-07-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797.pdf>.
- [23] CAS 2015/A/4220 Club Samsunspor v. Aminu Umar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EB/OL].(2016-07-12)[2021-09-11].<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4220.pdf>.
- [24] CAS 2015/A/3999 Al Ittihad Club v. Diego de Souza Andrade & CAS 2015/A/4000 Diego de Souza Andrade v. Al Ittihad Club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EB/OL].(2016-03-17)[2021-12-26].<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999,%204000.pdf>.
- [25] CAS 2014/A/3739 & 3749 Jonathan Mensah & Evian Thonon Gaillard FC v.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 Udinese Calcio S.p.A [EB/OL].(2015-04-30)[2021-11-2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739,%203749.pdf>.
- [26] CAS 2008/A/1568 M. & Football Club Wil 1900 v. FIFA & Club PFC Naftex AC Bourgas [EB/OL].(2008-12-24)[2021-12-11].<http://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568.pdf>.
- [27] 向会英. 体育自治与国家法治的互动: 兼评 Pechstein 案和 FIFA 受贿案对体育自治的影响[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6, 40(4): 42-49.
- [28] CAS 2014/A/3765 Club X. v. D.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EB/OL].(2015-06-05)[2021-12-20].<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765.pdf>.
- [29] CAS 2006/A/1123 Al-Gharafa Sports Club v. Paulo Cesar Wanchope Watson & CAS 2006/A/1124 Paulo Cesar Wanchope Watson v. Al-Gharafa Sports Club [EB/OL].(2006-12-18)[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1123,%201124.pdf>.
- [30] CAS 2011/A/2473 Al-Shabab Club v. Saudi Arabian Football Federation (SAFF) [EB/OL].(2012-02-23)[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2473.pdf>.
- [31] CAS 2020/A/7090 Club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Venados FC Yucatán & CF Correcaminos v. Federación Mexicana de Fútbol (FMF) & Mexican Liga MX/Liga Ascenso MX [EB/OL].(2020-11-19)[2022-12-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7090.pdf>.
- [32] 罗小霜. 论职业足球合同违约的体育制裁[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2, 29(6): 671-675. (下转第 51 页)



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注4】(2015)辽01民终字第1986号判决书。

【注5】(2018)辽01民再32号裁定书。

【注6】(2019)辽02民终5196号裁定书。

【注7】(2019)辽民申6090号裁定书。

【注8】(2022)辽01民终18268号判决书。

【注9】(2020)沪0104民初1814号裁定书。

## 参考文献:

- [1] 朱涛.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范围[J].体育科学,2022,42(9):3-8.
- [2] 孙丽岩.仲裁法框架内体育仲裁模式的构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3):23-27.
- [3] 谭小勇.中国“体育仲裁”制度建设之中间道路:以建立统一而相对独立的内部仲裁制度为视角[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6,33(6):657-665.
- [4] 刘万勇.足球行业法律关系概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72.
- [5] KALELIOĞLU C. Domestic sports arbitration in Turkey: Creating a Sui generis sporting jurisdictional order Alla Turca[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2017, 17(1):33-48.
- [6] RAZANO F, Keeping sport out of the courts: The national soccer league 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J].African Sports Law and Business Bulletin, 2014(2):2.
- [7] 李耀磊,尚荣敏.体育纠纷解决途径研究[J].河北法学,2018,36(7):186-192.
- [8] KELVIN C. Omuojine, Dispute resolution in nigerian football: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chamber[J].African Sports Law and Business Bulletin, 2014

(2):22.

- [9] EDWARD P. Dispute resolution in sport: The role of sport resolution (United Kingdom)[J].Sweet & Maxwell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Review, 2010(1):1.
- [10] ALEXANDRA V. Re-questio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in light of the scope of its review[J].Sweet & Maxwell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Review, 2013(4):110.
- [11] 董金鑫.我国足球劳动合同争议的司法处理[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6,33(6):652-656,665.
- [12] 尹雪萍.国际体育仲裁中指定仲裁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 Alejandro Valverde 兴奋剂案为视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3):232-236.
- [13] SMOKVINA V. New issues in the labour relationships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Social dialogu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autonomous agreement in Croatia and Serbia and the new sports labour law cases[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2016, 15(3-4):159-171.
- [14] 姜熙,谭小勇.我国建立职业运动员工会的法律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26(2):179-184.
- [15] 董金鑫.论我国单独的体育仲裁法的制定[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3):39(3):28-33.
- [16] 黄晖,张春良.国际体育仲裁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99.
- [17] JACK J. Coe, secrecy and transparency in dispute resolution: Transparency in the resolution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adoption, adaptation, and NAFTA leadership[J]. Kansas Law Review, 2006(1):1342.

(责任编辑:黄笑炎)

(上接第38页)

- [33] CAS 2011/A/2670 Masar Omeragik v. Macedonian Football Federation (FFM)[EB/OL].(2013-01-25)[2022-01-09].<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2670.pdf>.
- [34] CAS 2014/A/3754 Metallurg Donetsk FC v.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 Marin Aničić[EB/OL].(2016-06-28)[2021-01-10].<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3754.pdf>.
- [35] 姜世波,张洪振.“相称性原则”在国际反兴奋剂案件中的适用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3):47-52.
- [36] 张鹏.国际体育仲裁中比例原则适用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1):58-61,97.
- [37] CAS 2017/A/5011 Eskisehirspor Kulübü v. Sebastian Andres Pinto Perurena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

ball Association(FIFA)[EB/OL].(2017-07-11)[2021-12-26].<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5011.pdf>.

- [38] CAS 2016/A/4495 Hakan Calhanoglu v. Trabzonspor FC &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 CAS 2016/A/4535 Trabzonspor FC v. Hakan Calhanoglu[EB/OL].(2017-02-02)[2022-01-10].<https://jurisprudence.tas-cas.org/Shared%20Documents/4495,%204535.pdf>.
- [39] 张勇,王瑞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303.

(责任编辑:晏慧)